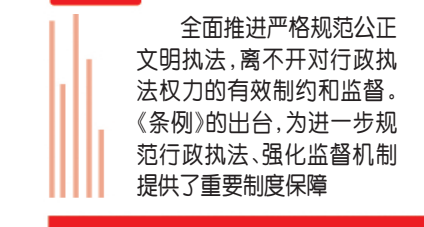




完善监督体系确保执法严明

法治观察



□ 赵 鹏

近日,国务院公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和规范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强化法治政府建设,对于完善法治监督体系,确保执法严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行政执法是法律实施的关键环节,也是行政机关履行政府职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重要方式。执法贵在严明。只有做到严格执法,才能有效遏制

各种违法投机行为,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只有做到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才能建立稳定预期,强化全社会对法律秩序的心理认同。而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离不开对行政执法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条例》的出台,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强化监督机制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首先,《条例》推进了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制度化、法定化,形成了统筹行政执法工作的基本方式。在当下的制度实践中,虽然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政府督查等制度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功能,但仅凭它们,尚不足以形成严密的监督体系。

其中,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依据当事人的诉请而开展,通常只矫正具体违法行为本身,而无法主动矫正行政执法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其对于违法行为产生的源头因素,如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保障等方面的管理制度缺失以及行政执法规范化、正规化,专业化建设滞后等深层次问题很少触及。政府督查虽然可以对上述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并要求整改,但其任务覆盖范围广,行政执法只是其中一项内容,难以形成对行政执法活动的常态化监督。

在此背景下,《条例》将我国长期探索形成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验制度化、法定化,按照规范与指导并重、预防与纠错并重、监督与保障并重等原则进行规则设计,有助于统筹协调行政执法活动。

其次,《条例》强调制度建设与行为规范并重,提升了对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行政执法对外表现为开展监督检查、采取强制措施、实施行政处罚等一系列具体行为。近年来,检查过多过滥、“小过重罚”等不规范执法行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重视对执法行为的规范,也需要关注引发这些问题的制度因素。

对此,《条例》在监督范围上采取了执法行为监督与制度建设情况监督并重的思路:一方面,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如关注执法程序是否合法、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是否存在不作为或乱作为行为等;另一方面,监督执法机关贯彻落实行政执法各项制度的情况,如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证件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行政执法程序制度的执行情况,行政裁量权基准等行政执法标准制度的落实情况,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行政执法责任确定、行政执法状况评议、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等相关制度的执行落实情况等。

在实施《条例》的过程中,要统筹兼顾这两个方面,实现有机贯通。特别是要对行政执法监督中出现的普遍性、规律性问题进行研究总结,提炼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提升制度建设的科学化、精准化水平,从而增强行政执法监督解决系统性、结构性问题的能力。

最后,《条例》推动行政执法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相协同,有助于形成监督合力。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等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行政执法监督属于行政机关体系内部的监督,理应加强与其他类型监督的协同。

为此,《条例》规定行政执法监督应当加强与监察监督的贯通协同,健全信息共享和线索移送机制;加强与政府督查、行政复议等的协调衔接,建立健全工作沟通和信息共享机制;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争议引导当事人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对已经进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的行政争议不重复监督等。这些规定旨在加强协同配合,避免监督重叠,其有效实施将助力完善我国监督体系,推动实现行政执法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

基层调研

□ 刘彩霞

丰镇市地处山西与内蒙古两省区交界,很狭长,自古为民族交融之地,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南大门”。独特的区位优势与深厚的历史积淀,孕育了丰镇人民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精神品格。欲筑室者,先治其基。作为守护边疆法治的基层堡垒,丰镇市人民检察院将检察文化与地域文化相结合,从明长城的巍峨中感悟坚守之志,将晋蒙地域风骨、红色革命基因与检察履职实践深度交融,走出一条以文化人、以文润检的基层检察文化建之路。

以政治建设引领检察文化建设。我们坚持将政治引领融入文化建设各环节。在机制层面,通过制定专项规划与融合实施方案,将文化建设从“软任务”转变为“硬指标”,构建起“实践为本、融合为要、全员为基”的工作格局,将文化建融入检察履职全过程。在基础建设层面,坚持以文化人、以物载道,通过法治书斋浸润心田、办案手记镌刻忠诚、司法档案砥砺信念、榜样展板催人奋进,让办公环境成为文化传播的鲜活载体。在活动实践层面,跳出“院内小循环”,以志愿服务、法治宣讲、企业“法治体检”等形式深耕基层,用晋蒙方言搭配“顺口溜”普及法律知识,让检察文化在服务群众中落地生根,用法治温暖浸润人心。

在高质量办案中践行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法治的生命线。我们以“高质量办好每一个案件”为导向,弘扬“蒙古马精神”,以品牌建设赋能检察履职。在公益保护领域,组建专业团队,与邻省检察机关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成功办理河道污染治理、明长城遗址保护等有社会影响力的公益诉讼案件,通过清淤、拆违、整改等举措守护公共利益,生动践行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承诺。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深度参与“北疆蒙芽 晨曦未检”建设,打造“检小妮”普法微课堂,实现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法治副校长全覆盖,构建起多元化青少年普法阵地。秉持“小案精细办”理念,化解多起疑难民事纠纷,其中一起成功办理的困扰当事人十余年的离婚难案件,获评2024年区级护航民生民利典型案例;建立跨省司法救助协作机制,破解当事人异地求助难题,切实减轻群众诉累。

在队伍建设中夯实检察事业根基。做好检察各项工作,离不开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检察队伍。我们构建系统化育才体系,推出“绿卿书社”文化品牌,为队伍建设注入文化动能。书社收藏各类书籍,定期组织读书分享,“围炉话检”等活动,着力打造检察人员的精神家园与“成长充电站”。坚持常态化学习机制,每周固定开展集中学习,检察长带头授课、业务骨干交流办案技巧,同时邀请党校教师、上级及兄弟检察院能手来院授课,确保学有所获。深化“京蒙检察协作”,选派干警赴先进地区跟班学习,通过“云课堂”、跨区域交流共享优质资源;联合政法各单位开展同堂培训,学习前沿司法技术,推动形成“理念共识、能力共进”的良好局面,为检察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在守正创新中推动融合发展。在创新基础上守正,才不会故步自封;在守正基础上创新,才不会偏离方向,我们推动检察文化与地域特色、主责主业深度融合,聚焦丰镇月饼等地方特色产业,依托检察知识产权检察保护联系点,提供“组团式”服务与“点单式”宣讲,用法治力量守护产业传承。打造专业化新媒体工作室,整合资源创作多部原创作品,联合融媒体中心推出普法微电影,在中央及省市级媒体刊发多篇稿件,不断扩大检察工作覆盖面与影响力,让法治声音传播得更广更远。

长城不语,见证法治担当;半川奔流,吟唱为民初心。丰镇市人民检察院的文化建设实践,让检察精神融入边疆治理血脉,让法治信仰扎根群众心中。新征程上,我们将继续以文化为帆,以精神为桨,推动检察文化从“形式建设”向“内涵发展”跨越,从“内部培育”向“外化于行”延伸,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丰镇、法治丰镇贡献更多检察力量。(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社情观察

英烈尊严不容亵渎

□ 董方萍

近日,安徽广德警方侦破一起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件:当地居民张某某伙同吴某某等前往新杭镇横岗村烈士陵墓附近直播,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吴某某故意脚踩烈士陵墓,张某某不仅不制止,反而怂恿其攀爬坟墓摆造型。目前,二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事短视频账号也被封禁。

烈士陵墓是民族精神的丰碑,是后人缅怀英烈、寄托哀思的庄严圣地。每座烈士墓碑背后,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每块石碑上镌刻的名字,都曾以生命守护家国安宁,这里本应肃穆宁静,却在“流量至上”的扭曲价值观驱使下,被个别主播当作“秀场”甚至“直播间”,他们所认为的“创意”或“玩笑”,实则是对历史的无知、对英雄的侮辱,更是对民族情感的严重伤害。

张某某等人在烈士墓前嬉笑摆拍,乍看是头脑发热的失当之举,实际上暴露了其精神世界的空虚与道德底线的失守,他们将缅怀异化为表演,使肃穆沦为喧嚣,这种以消费英烈换取流量的行为,早已背离了纪念的本义。更令人忧心的是,此类内容经短视频平台迅速扩散,极易误导公众尤其是青少年,使英烈精神在娱乐化、低俗化传播中被稀释和解构。

我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张某某等人的行为不仅是道德失范,更是触碰法律红线。当地警方迅速依法处置,彰显了“法律不容挑战”的坚定立场,也为所有网络参与者划清底线:烈士陵墓绝非流量经济下可以随意使用的“背景板”,英烈尊严不容亵渎。

守护烈士陵园的庄严,需要多方合力。网络平台应强化内容审核,运用技术手段识别、拦截涉英烈的低俗不当内容,并可以考虑建立“英烈纪念”专项审核机制。监管部门应加强协同治理,坚持对违规账号“零容忍”,形成有效震慑。对于每位公民来说,以静默凝视、虔诚鞠躬的行动替代镜头前的表演,更能表达对英烈的敬慕和怀念。

英烈精神从不需要点赞数衡量,历史之重也非流量可承载,真正的缅怀是心灵的对话,精神的传承。唯有远离喧嚣,回归肃穆,烈士陵园才能成为民族精神的永恒坐标,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庄严与神圣,让英烈安息之地始终浸润在宁静之中。

法律人语

□ 邢红枚

今年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暨《北京宣言》与《行动纲领》通过三十周年,为弘扬妇代会和全球妇女峰会精神,推动我国反家庭暴力法进一步落实,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和指引作用,最高人民法院不久前从近三年生效的涉家暴案件中选择了8个典型案例公开发布。

这些案例覆盖婚姻关系、同居关系、亲子抚养等领域,生动展现了人民法院在反家暴领域持续发力,不断深化反家暴法律适用、证据认定及处置措施等的努力,每一份判决都传递着国家对家庭暴力“零容忍”的坚定态度。典型案例既突出了对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保护,同时也体现出多部门联动推进反家暴工作的扎实成效。

第一,案例彰显了反对一切形式家庭暴力的司法理念。家暴不是“家务事”,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犯罪行为。我国于1980年批准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政策立法方面始终坚持反对一切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禁止家庭暴力。在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实践清晰界定了精神暴力的类型——无论是威胁、辱骂等贬损人格的行为,还是以自杀、自残相胁迫的控制手段,都被纳入家暴的惩戒范围。如在鲁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鲁某与丈夫邓某发生争执后,邓某从厨房拿出菜刀以自残相威胁,要求鲁某妥协,鲁某在阻止邓某自残过程中被其推倒在地

受伤。法院从家庭暴力的控制本质出发,认为邓某虽未直接对鲁某实施身体暴力,但其自残行为使鲁某产生紧张恐惧情绪,符合家庭暴力的概念特征,构成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遂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该裁判在纠正人们对家庭暴力的错误认知基础上,进一步把握了家庭暴力的核心本质,阻止了可能升级的暴力行为。

第二,案例锚定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核心原则。在这批典型案例里,未成年人是直接保护对象的有4个,另有2个是在保护受害妇女的同时间接保护了儿童,凸显了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呵护。在涉未成年人案件证据收集认定方面,法院充分考量未成年人身心特点,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为中心构建证据链条。如在任某强奸、猥亵儿童案中,任某始终否认猥亵及强奸王小某,受害人王小某前两次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都肯定性陈述了遭受任某性侵害的具体过程及细节,在第三次询问时却予以否认,称自己之前在撒谎。法院耐心审查后发现,王小某陈述出现反复系其母亲干预所致,因而对第三次陈述不予采信。鉴于被害人前两次陈述具有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条,法院据此认定了任某强奸、猥亵王小某的犯罪事实。该判决不仅依法严惩了施暴者,更以司法刚性为未成年人筑牢“安全盾”。此外,相关典型案例还重申了管教子女绝非施暴借口,施暴者一般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司法态度。

第三,案例凸显了多部门联动反家暴的治理效能。家暴的复杂性决定了防治工作绝非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需要多部门通力合作。目前,我国已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的反家暴工作体系,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正是这一体系成效的生动注脚。在鲁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数智赋能让反家暴联动机制跑出了“加速度”——鲁某报警后,派出所协助其线上向法院提交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并上传证据,法院收到申请后通过数字平台审查认定鲁某遭受家庭暴力,20分钟内就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并在线送达双方当事人。通过一站式联动闭环干预机制,避免了受害人在各部门奔走,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生效后,法院又联合公安、妇联、基层组织等开展跟踪研判,及时进行后续处置和救济,形成了“签发—送达—执行—回访”闭环,让司法温度从“一纸裁定”延伸到持续守护,有力助推了反家暴的社会共治。

这些典型案例不仅传递了司法机关坚决反对一切形式家庭暴力的鲜明司法态度,更彰显了我国以法治保障家庭成员合法权益、以共治守护社会和谐的决定心。同时,每个判决都在提醒我们:家是温暖的港湾,绝非暴力的战场;亲密关系的羁绊,从来不该成为伤害的借口。(作者系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善治沙龙

□ 尹锋林

最近,司法部、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纠纷仲裁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精准回应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现实需求,为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提供了明确指引。

知识产权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要素,其保护水平直接关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当前,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纠纷呈现数量持续增长、类型日益复杂,专业化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特点。仲裁制度所具备的专业性、灵活性、保密性和国际执行力等独特优势,与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需求高度契合。《指导意见》立足这一现实,通过制度设计,将仲裁机制深度融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知识产权保护注入了新的制度动能。

《指导意见》首先聚焦知识产权仲裁专业能力的提升。专业化是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核心要求。知识产权纠纷往往涉及复杂的技术事实和法律问题,需要仲裁人员兼具法律素养和专业技术背景。《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支持仲裁机构设立知识产权仲裁院(中心)等内设部门,建立专门的仲裁员名册和专家库,从商标专利审查员、预审员、知识产权律师、专利代理师等专